

外
交
家

阿爾德里奇著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第三四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一一〇〇〇冊

原書名 The Diplomat
著者 James Aldridge
原出版者 Little, Brown & Co.,
New York, 1950.

書名	外文家
著者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
校閱者	周江士
譯者	劉范如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排版者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三 四六號七〇一室
印刷者	蔚文印刷公司
定價	人民幣三五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類別〕文學藝術 [開本] 25 [定價頁] 860 [字數] 526,000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

中譯本序

這是一部很好的政治小說。由於它對於和平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的貢獻，出版後不久就由英國和平委員會推薦參加國際和平獎。作者詹姆斯·阿爾德里奇 (James Aldridge)，因為這作品，今年也已在布達佩斯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國際和平金質獎章」。

小說是以伊朗民族獨立運動為背景，寫出美、英在中東各地的政治陰謀，從中襯托出蘇聯的和平政策。它從一些外交家的生活，寫出莫斯科、伊朗和倫敦的不同情調。這裏有斯大林的丰采，有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的雄辯，有英國老外交官的真面目，有年輕一代對真理與和平的追求，有新與舊的搏鬥。而這一場搏鬥，是安插在一個動人的三角戀愛故事裏。

書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艾瑟斯爵士——一個英國統治階級的典型代表——是貴族出身的職業外交官，圓滑能幹，滿腦子西歐貴族生活的傳統。他有許多長處，可就看不見新事物。他的每一種長處也就是他的短處，因為他根本是腐朽社會中的寄生蟲，他逃不過他那個階級給他的限制。麥格利哥——一個守正不阿的蘇格蘭科學家——他是艾瑟斯的助手，是他的情敵，也是他在政治上的對頭。嘉瑟林·克萊夫，一個貴族門第的女子，感情用事，人們無法預料她的行動。可是她

不留戀她的階級，不故步自封。她張大眼睛，逐漸認識新的現實，最後她選擇了麥格利哥和他的新世界，揚棄了她的過去，也就是揚棄了艾瑟斯所代表的舊世界。

雖則是個三角戀愛故事，其實是一個現代人的「天路歷程」。麥格利哥從莫斯科的外交會議桌上學習，從伊朗北方少數民族的獨立鬥爭中學習，從倫敦英國國會的形形色色中學習，終於認識到舊社會中那些不願改變現狀的人都是既得利益分子，他們寧願把這世界推向戰爭和災難，而不願取消他們既得的利益。就在這一連串的教訓中，他認識了新世界的去向，建立了他的新人生態度，樹立新的奮鬥決心。

故事以艾瑟斯和麥格利哥飛到莫斯科開始。作者從容不迫地寫下去，精細刻畫着他的人物，描寫着莫斯科英國大使館的形形色色——它的故意與外界隔絕，不願了解蘇聯人的生活，却甘心從幾個渺小的間諜手裏去收買情報。作者又以同樣辛辣的筆調，勾出了莫斯科一般英、美記者的嘴臉，那般傢伙都自認是他們本國政府反蘇政策的工具。艾瑟斯很老練地運用了駐在莫斯科的美、英記者，自以為也可以同樣輕鬆地對付蘇聯人。他相信他一定可以擊敗莫斯科的人，因為，要不是世界變了，一個英國貴族怎麼能吃虧呢？他就不知道，這世界真的變了。一個新的世界早已出現了。

艾瑟斯這個舊世界的外交官，他只知道他那個過了時的世界。他跟莫洛托夫，後來又跟維辛

斯基之間的外交會議，就表現出新舊世界的矛盾。作者筆下的這些假想對話，寫得極動人。雙方一言一動，絲絲入扣，令人讀來不忍釋手。

接着，故事背景移到伊朗北方的沙漠、山林和少數民族之間，出現了許多驚險場面。作者在這裏寫出了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真實情況。我有個朋友在伊朗住過幾年，他就最佩服這小說的這一部份。說是寫得很逼真，富於伊朗情調。

最後的背景是倫敦。艾瑟斯、麥格利哥和嘉瑟林都回到倫敦來了。艾瑟斯杜撰了一篇報告，準備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利用美、英「多數」，再來譴責蘇聯。麥格利哥經過了思想上的許多鬥爭，終於毅然決然公佈了他所看見的伊朗民族運動的真相，使艾瑟斯的陰謀無法實現。經過英國下議院一場激烈辯論，麥格利哥被明令解職，可是却得到了嘉瑟林。兩人一同準備開始新的生活。

這是一本誠實的書。在西方一般作家都還在怪誕瑣碎中兜圈子的時候，一個有天才的小說家却勇敢地選取了爭取世界和平這個偉大主題，以他高度的藝術技巧，寫下了一些活鮮鮮的人物，提出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表現了重大的真理。在今天西方墮落的文藝氣氛中，他毫不妥協，寫出了這樣一本誠實的文藝作品，真像一陣清勁的風吹散炎蒸的沙漠。它的形式跟它的政治主題組織得很完美，始終保持着平衡，一切都是作品裏行動和人物的發展所必需的。政治是這部小說的

心靈，可是它的原動力却是現實生活的自然發展。它沒有流於空洞的口號化，因此也就很有說服力。

人們都公認，外交家（“The Diplomat”）不僅是英國近七、八年來出現的最優秀的小說，也是近年世界文壇上稀有的傑作，跟法國阿拉貢（Louis Aragon）的共產黨人（“The Communist”）和安德列·斯蒂（Andre Stil）的第一次打擊（“Le Premier Choc”），蘇聯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的第九個浪頭（ДЕВЯТЫЙ ВАЛ），美國法斯特（Howard Fast）的斯巴達克斯（“Spartacus”）一樣，對世界和平運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的。

作者阿爾德里奇先生今年不過三十四、五歲，是澳洲人，一九三八年才到倫敦去。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擔任過倫敦太晤士報和美國紐約時報的戰地記者。他到過挪威、希臘和中東各地，也到過莫斯科和伊朗。他的第一本小說叫光榮的人們（“Signed with Their Honour”），描寫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空軍的生活，被譽為「最優秀的描寫戰爭的書」。他的第二本小說海鷹（“The Sea Eagle”）得過英國的「約翰·劉威林·萊斯文藝獎」（John Llewellyn Rhys Prize）。他還寫過一本小說第四十九州（“The 49th State”），一本速寫集“人物誌”（“Of Many Men”）。在外交家之後，他又寫出了以加拿大森林生活為背景的獵人（“The Hunter”）。

外交家一九四九年由倫敦的波德萊赫書店（The Bodley Head）出版，立刻震動了英、美的讀

書界。一九五〇年，又由里特布朗書店(Little, Brown & Company)在美國出版。俄文譯本也於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是加雷舒尼柯伏依、加希基娜和托貝爾(E. КАЛАННИКОВАЙ, И. КАШКИНА и В. ТОПЕР)三人合譯的。這本中譯本是根據一九五〇年美國里特布朗書店的初版譯出的，曾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十個月之久。因原書篇幅過鉅，連載時不得不加以節略，而伊朗那一部份則全部略去，現在感謝江士瞳先生給我把這一部分節譯出來。單這樣已經超出五十萬字了。

阿爾德里奇先生這些年一直住在倫敦。我們有好些共同相識的友人，可惜我在英國的時候沒見到他。我已去信請他爲這中譯本寫一篇序，這篇東西還沒有到，只好以後再加入了。

由於這本小說在蘇聯很受歡迎，這裏附譯了蘇聯批評家塞爾蓋耶娃(N. Сергеева)的一篇書評，作爲幫助我們欣賞這本小說的參考。

譯這本小說是我第一次大胆的嘗試，希望讀者們多多批評。這譯本的出版，應該特別感謝煦良先生，謝謝他的校閱和多年來的鼓勵。

劉 茂 如

一九五三年八月，香港，大公報。

評阿爾德里奇的「外交家」

N·塞爾蓋耶娃
(N. Sergeyeva)

詹姆士·阿爾德里奇，這位澳洲生長的英國小說家，寫了一本新小說，已由英國和平委員會推薦參加「國際和平獎」。只是這一點就應該引起人們注意這位天才作家的新作，他早期的作品海鷺和第四十九州已使他聞名於英、澳兩國之外。

二次大戰期間，阿爾德里奇是倫敦太晤士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的記者。他到過挪威、希臘和中東。也訪問過莫斯科和伊朗。顯然，也就是這種新聞記者工作，促使他這個小說家以國際政治中的尖銳而灼熱的問題來作為題材。他在這本新書裏，總結了他對於英國外交部的外交實施和外交政策的觀察。他指出了英帝國主義最可非議的地方——它對於弱小國家的掠奪政策。阿爾德里奇選取了英國戰後在伊朗的陰謀，特別是她壓制伊朗阿塞爾拜疆的民主運動的行動，來說明英國外交上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掠奪和專橫無忌的手法。他只是運用了真實的事件來作為情節的基礎。他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是虛構的。但是他以無可非議的精確性，說明了英國外交政策的特性。故事的基礎是伊朗的實事，他的人物的活動都發生在德黑蘭、塔布利茲和庫欣遊牧民族所居住的山地，可是誰都看得出來，阿爾德里奇所處理的，基本上主要是英國的一般政策和外交活動。

伊朗的阿塞爾拜疆發生了一個廣泛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個地方民主政府成立起來了，它實行了一些基本的民主改革，努力克服那個地區長期的落後和貧困。在英、美控制下的反動的德黑蘭政府，無法和這一運動競爭。倫敦方面對於伊朗阿塞爾拜疆的發展，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對於它在中東的石油利益的一個威脅。要派遣英國軍隊去直接干涉伊朗阿塞爾拜疆，那是不容許的，因為伊朗境內駐有蘇聯的軍隊，同時又有英、蘇、伊三國條約的存在。

為了欺騙輿論，英國的統治人物捏造了一個故事，說伊朗阿塞爾拜疆的運動是「莫斯科的作品」，並且大嚷大鬧，要人們相信這說法。英國外交部把一個重大任務交給他們最出色的一個外交官艾瑟斯爵士：要他到莫斯科去進行外交戰，預為佈置，以便進而大舉干涉伊朗內政，摧毀民主運動。

艾瑟斯爵士是英國外交部中一個狡猾而富有經驗的代表人物，是那些貴族之一，他們世世代代撐持着英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傳統，政府儘管在變來變去，不論是工黨，自由黨，或是保守黨，他們總是照樣做官。

隨同艾瑟斯爵士去莫斯科的是外交部的一個年輕官員，伊弗里·麥格利哥。他這人是屬於另一代，另一社會環境的。一個古生物學家，在伊朗長大，他跟他父親（也是一個地質學家）住在那邊，麥格利哥是戰時從軍隊裏調到外交部來的。選中他做艾瑟斯的隨員，是因為他是個專家，熟

悉伊朗語言，熟悉那個國家，而對於伊朗的情況艾瑟斯是最搞不清楚的。麥格利哥尊重伊朗人民。他在伊朗長大，他跟那個國家分不開，他了解它。而他完全不了解艾瑟斯；對於艾瑟斯，伊朗這許多活着的人民，不是一個民族，不是有生存權利的國家，不過是「英國的利益範圍」——首先是石油利益。

在莫斯科的英國大使館裏，艾瑟斯和麥格利哥結織了小說中的第三個中心人物，嘉瑟林·克萊夫。嘉瑟林這女孩子很聰明，她實際上管理着大使館裏的一切日常事務，大使館的負責人則是一個毫不出色、相當愚蠢的職業外交官，法蘭西斯·德萊克。嘉瑟林·克萊夫對於國際事務頭腦很靈敏，她不難看出帝國主義政策是多麼可惡的。她起初還不過是冷嘲熱諷，後來就逐漸轉變為對英國政府卑污的外交陰謀公開憎惡了。

小說裏主要人物的生活，都環繞在伊朗事件的周圍。

艾瑟斯爵士來到莫斯科，滿懷着十分無恥的自信精神。他相信，在外交場中他是打不垮的。他沾沾自喜，自以為高人一等，適足以加重他後來失敗的慘重。他那些狡猾的外交詭計，一碰上蘇聯的誠實、和平、民主的政策，就粉碎無遺了。

阿爾德里奇對艾瑟斯爵士在莫斯科的外交決鬥描寫得很動人。艾瑟斯的一切騙局、威脅、陰謀、嘲諷和哀求，全不中用，就像橡皮球碰在石頭牆上，都彈了回來。蘇聯政府決不干涉伊朗內

政。它不會中計，也不考慮任何犧牲伊朗人民的勾當。蘇聯方面提出了無數不庸辯駁的事實來說明：伊朗阿塞爾拜疆的人民是在決定他們自己的事情。而艾瑟斯爵士却提不出任何證據來支持他的無稽之談，說什麼伊朗阿塞爾拜疆的人民運動是「莫斯科的作品」。

蘇聯方面建議他到伊朗阿塞爾拜疆，自己去看看那邊的情形，這位英國外交家卑鄙地利用了這個建議。他去了，可不是去了解情況，查明事實，却是去跟伊朗的反動派和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官們商談進一步反對伊朗阿塞爾拜疆的行動。艾瑟斯故意繞道經過庫狄族區域到塔布利茲去。他收買庫狄族的酋長，煽動他們自相殘殺並且反對阿塞爾拜疆的民主人士。艾瑟斯所了解的外交，就是這一套。

艾瑟斯出使是一場失敗，不過他另有外交陰謀的詭計。他要來搞庫狄族的「獨立」了！同時，英國工黨政府也決定利用艾瑟斯這次訪問，作為藉口，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散播它所捏造的莫斯科干涉伊朗阿塞爾拜疆內政的說法。艾瑟斯杜撰了一份觀察報告。他奉派為英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報告這個問題。

這個計劃就在麥格利哥和嘉瑟林眼前進行，他們兩人隨同艾瑟斯旅行各地。麥格利哥眼看着艾瑟斯這些詭計，他認識了這種捏造國際衝突和英國干涉伊朗內政的極端邪惡。一開始他就跟艾瑟斯爭論。這個年輕人對政治和國際事務是素不關心的，他唯一的夢想就是避開外交任務，回到

他的科學工作上去，他終於一反故態投身到這場政治鬥爭裏來了。

麥格利哥爲矛盾的感情和激動所苦。一方面是他對政治缺乏主動，對他所服務的政府又有一種天然的忠誠。另一方面，他的良心却又反抗艾瑟斯無恥的外交手段，反抗帝國主義爲政策的顛倒黑白，反對施於伊朗人民的殘暴。最後，正直和良心佔了上風：在安全理事會開會前夕，他寫了一封信給報紙，公佈了「最近跟隨艾瑟斯爵士訪問伊朗的一些觀察」。

他的揭露徹底摧毀了英國外交在這問題上的立場。他說：

「阿塞爾拜疆要求獨立自主的鬥爭是真實的，並且是由當地發動的……阿塞爾拜疆一向就在鬥爭，要推翻腐敗的伊朗政府加於它（和伊朗其他地區）的封建條件……」

「也許有一些間接的蘇聯影響，不過我要指出：那是比我們自己對伊朗的影響小得多，我們以直接控制內閣閣員、政黨、國家財政，和施行小賄來左右伊朗。至於說到庫爾人的獨立運動，庫爾人要求自己取得的獨立，而不是由英國政府一手包辦的獨立……」

這封短短的信真像一顆炸彈。艾瑟斯給公開揭露爲撒謊的人，他憤怒得像一條野牛。他向麥格利哥大發雷霆。麥格利哥受到恫嚇，不僅要革他的職，而且還要控告他洩漏國家機密。艾瑟斯威脅他，凌辱他，想強迫他撤回他的聲明，那些資產階級報紙也對他極盡辱罵之能事。

但是，很奇怪，壓力越大，越是強迫他撤回他所認為公正的言論，他的抵抗力和堅持立場的決心也就越來越強。靠了嘉瑟林的協助，他邀請了齊集倫敦探訪安全理事會消息的記者們，全盤揭穿了艾瑟斯外交陰謀的駭人聽聞的詳情。他告訴那些記者們，艾瑟斯的目的是要恢復德黑蘭反動政府在阿塞爾拜疆的勢力。

「我們從到莫斯科那一天起就進行欺騙。我們自以為可以使蘇聯人上當，局滅我們的計劃，而我們却是為我們在伊朗的利益打算。大使館裏的人，一談到政治，個個都是這一套。在我們談話中，根本無所謂弱小國家和『自由人民』的主權這類好聽的話，全是如何暗算蘇聯人的一個個毒計。蘇聯人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笨，所以我們就失敗了……我們無權在聯合國內控訴蘇聯干涉伊朗內政。我們一向在干涉伊朗，此時此刻我們就在干涉着。」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聲明在倫敦等地報紙上發表時會引起多大的騷動。英國在安全理事會上的肆意誹謗的提案，從此坍台了。可是麥格利哥也走頭無路了。他因為被控危害國家的大罪而張惶失措。他缺乏堅定的政治立場，事實上又沒有一定的政治見解和世界觀，他苦悶懷疑，有時甚至失掉了勇氣。他向嘉瑟林說：

「我相信我做了我一生最大的錯事。一個人無權想像他可以影響政治上的決定和本國的政府……我知道英國對阿塞

爾拜疆的態度是腐敗的、危險的、不道德的，我現在能做點什麼來改變這種態度……我有什麼機會來左右這個大國的道路呢？我能改變一個帝國麼，我能決定歷史麼，我能在一向談不上誠實的地方創造誠實的政策麼？……政府和政策就在那兒。你和我都拿它沒法辦。它太大，太有力，太有組織，太定型了……我白白毀了我自己……」

在這些階段中，阿爾德里奇藉麥格利哥的口說出一些胆小的人的想法，這些人準備放棄鬥爭，這些人給妄圖以武力服人的少數當權者的官方宣傳嚇住了，不信任人民的力量。麥格利哥了解，也尊重，伊朗人民有權利爭取他們的獨立和民主改革，並且相信他們的最後勝利，可是時候他却看不見，或感覺不到，英國人民也能成功地爭取到他們自己的權利，從他們的帝國主義統治者的陰謀下解放出來。

嘉瑟林責備麥格利哥沒有政治立場，沒有政治見解，她責備得很對。她叫他別以為在英國向不公平和邪惡的勢力挑戰的，只有他這一人。

「在你知道一個政治字眼之前，早就有人在為你的阿塞爾拜疆奮鬥了；不只是在阿塞爾拜疆，就在這裏到底都有的是。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場堅苦的戰鬥……不是為了你所希望的眼前的決定，而是為了包括一切政治的總決定：阿塞爾拜疆和艾瑟斯和安全理事會全都在內。」

麥格利哥的確並不孤獨，艾瑟斯之流和他們的政府的力量也不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已經採取了什麼步驟來懲誠麥格利哥的背信失職，這個引人爭論的問題，在下議院裏提了出來，議場上就有人提出質問：艾瑟斯爵士杜撰伊朗問題的報告書，又採取了什麼步驟來懲誠他呢？這一問惹得羣情憤慨。議會裏這場論戰是本書的最高峯。

兩個發言人在下議院裏唇槍舌戰起來——他們代表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英國帝國主義的政策，它的橫行不法，它的違反人民利益，不僅在湯姆·克倫威爾的激烈演說中給揭露了出來；也在最熱心的反動辯護者的裝腔作勢的演說中暴露了出來。這一場關於麥格利哥事件的辯論，在英國人民眼前揭露了工黨政府不體面的外交把戲和邪惡的外交政策。

麥格利哥沒有受到彈劾，可是他的公務員事業却從此結束。他被官方宣佈為背信失職。他在下議院裏受到這樣大的打擊，但是他從那裏出來却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在政治上的被動性去掉了。他已經重新考慮了他的悲觀態度。他不再認為政治只是艾瑟斯一幫人專利特權。他從此不能再做政府公務員；艾瑟斯在伊朗的不法冒險雖是慘敗了，却又立即接到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奉派到華盛頓去，這時馬歇爾計劃正在那裏醞釀；麥格利哥對這個事實並不感到沮喪。艾瑟斯掩飾着他的憤怒說：別以為你的勝利很有把握，年輕人，伊朗的糾紛並沒有解決；我們在華盛頓還要料理這件事情。對這幾句話，麥格利哥以他從來沒有的信心回答說：

「你在倫敦失敗了的事情，在紐約也許會成功。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却知道，你要伊朗聽你驅使，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隨你怎麼搞。你可以把德黑蘭的軍隊開到阿塞爾拜疆去，你可以摧毀新政府，鎮壓革命，但是你却決不能制止阿塞爾拜疆人或伊朗人一次又一次地起來革命，直到他們剷除了腐敗無能的政府、地主、警察、軍隊，和一切壓迫他們的東西，包括我們英國人在內。你在安理會裏做出的種種決定都不能阻止他們。你們那些決定都不把伊朗人放在眼裏，你們的無知和陰謀就在在這裏。」

麥格利哥決定從此不再不管政治。他決心到伊朗去，不是到英伊石油公司的科學實驗室去工作，是到伊朗阿塞爾拜疆去，跟伊朗的民主人士一起工作。他的私事也解決了——嘉瑟林，雖然艾瑟斯一直是滿有信心地在向她求婚，她這時也決定跟麥格利哥一起走。

這就是阿爾德里奇這本小說的梗概。這就無疑地是一本有趣的書，使它有趣的原因主要是書裏中心人物的性格。

艾瑟斯這個外交官的畫像就很清楚，明確而週到。他是英國統治階級的代表，老大的帝國主義英國的化身，他需要什麼他心中有數。他有着他的階級的一切荒謬絕倫、劫掠成性、橫行不法和狂妄自大，同時也有着他的階級的內在的不穩定和動搖。艾瑟斯這個典型，描寫得很動人，刻